



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

GANWEI
TIANXIAOIAN

钟晓毅 雷锋 吴爱萍 等著

海洋文化广东创新三十年

敢
天下
先



济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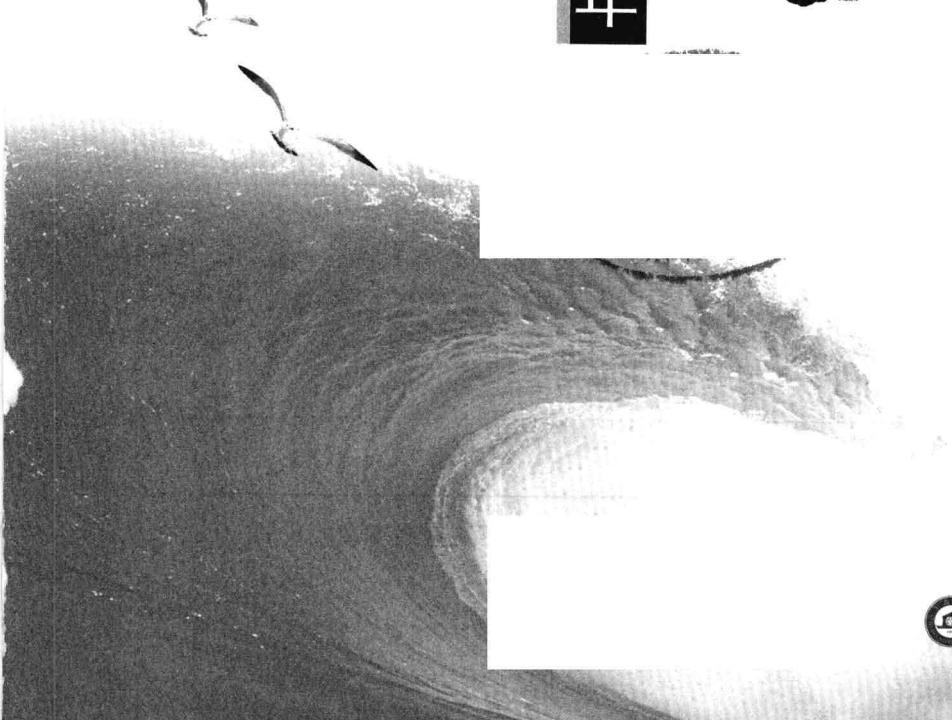


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

钟晓毅 雷 锋 吴爱萍 等著

海洋文化 广东创新三十年

敢
天下先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敢为天下先：海洋文化广东创新三十年/钟晓毅，雷锋，吴爱萍等著.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2008. 11

ISBN 978 - 7 - 81135 - 099 - 9

I . 敢… II . ①钟…②雷…③吴… III . 海洋—文化—广东省 IV . P722.6 -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56509 号

出版发行：暨南大学出版社

地 址：中国广州暨南大学

电 话：总编室 (8620) 85221601

营销部 (8620) 85225284 85220602 85220693 (邮购)

传 真：(8620) 85221583 (办公室) 85223774 (营销部)

邮 编：510630

网 址：<http://www.jnupress.com> <http://press.jnu.edu.cn>

排 版：广州市朗亿图文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印 刷：广东省农垦总局印刷厂

开 本：787mm × 960mm 1/16

印 张：12.25

字 数：250 千

版 次：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8 年 11 月第 1 次

定 价：30.0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目 录

上编 岭海听潮：海洋文化广东之本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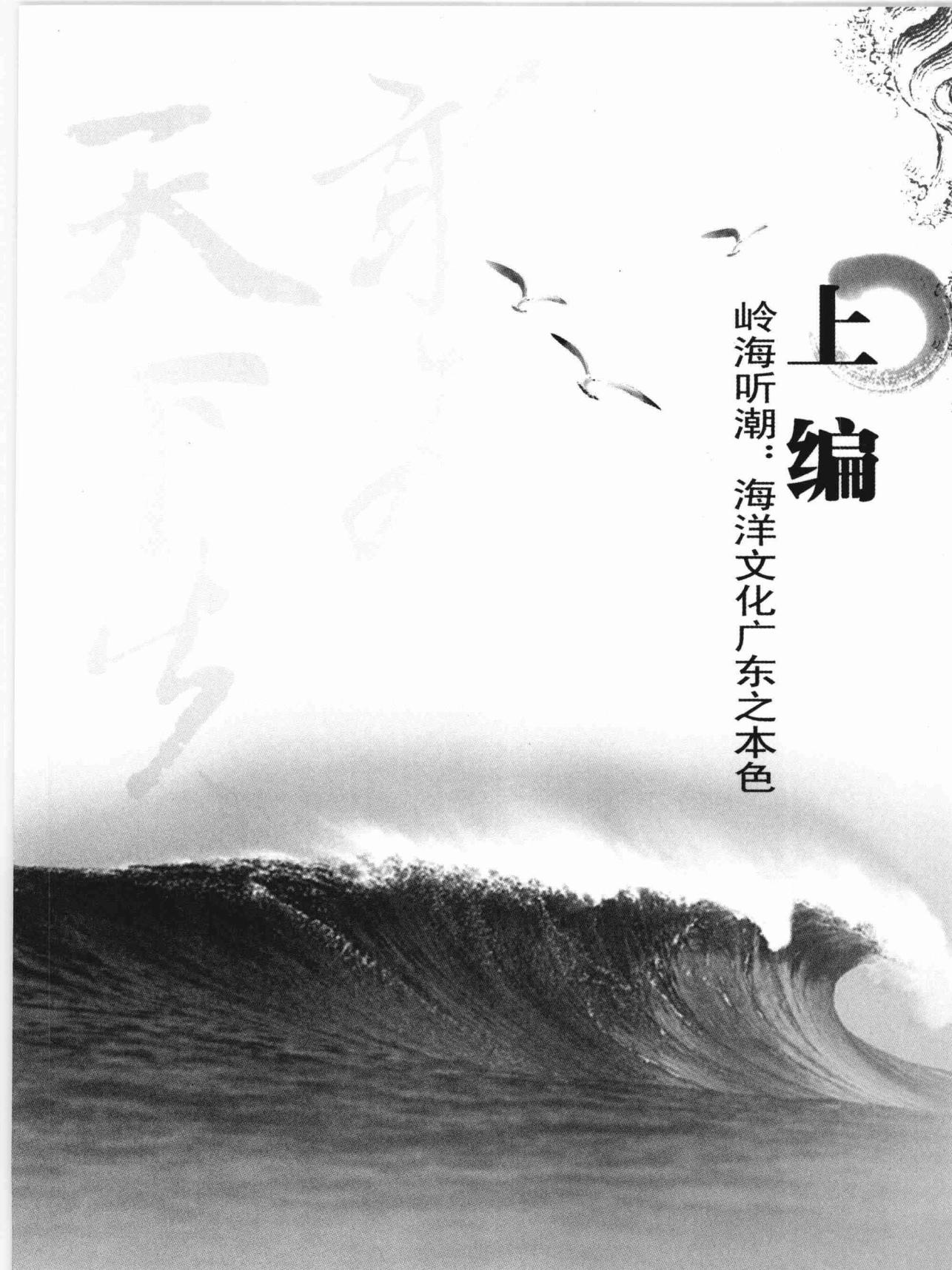
| | | |
|------------|-------------------------|------|
| 第一章 | 纵览：海洋文化在广东 | (3) |
| 一、 | 广东海洋文化的本质特征 | (4) |
| 二、 | 广东海洋文化的门类、特色及内涵 | (9) |
| 三、 | 广州海洋文化的时空脉络 | (15) |
| 四、 | 广东海洋文化精神的历史逻辑 | (18) |
| 第二章 | 海洋文化与广东改革先行 | (22) |
| 一、 | 选择广东：深沉的文化智慧 | (22) |
| 二、 | 潮涨潮涌三十年 | (26) |
| 三、 | 广东海洋文化的创新机制 | (31) |
| 第三章 | 海洋文化精神特质与“敢为天下先” | (37) |
| 一、 | 广东海洋文化精神的伟力 | (38) |
| 二、 | “敢为天下先”——杀出一条血路 | (42) |
| 第四章 | 海燕搏浪：一组价值支柱的感性显现 | (50) |
| 一、 | 海潮音：开放的旋律 | (50) |
| 二、 | 浪涌千层：多元价值与建构 | (53) |
| 三、 | 海纳百川：兼容与和谐 | (59) |

中编 逐浪扬波：海洋文化广东之创新

| | | |
|------------|----------------------|------|
| 第五章 | 开放精神叩响经济繁荣的旋律 | (69) |
| 一、 | 海洋文化催生了商品经济意识 | (69) |
| 二、 | 特区经济扬帆起航 | (77) |
| 三、 | 市场经济引领潮头 | (82) |
| 第六章 | 制度变革迎浪前进 | (88) |
| 一、 | 制度变革后浪推前浪 | (88) |
| 二、 | 民主政治建设潮流奔涌 | (94) |
| 三、 | 变革成果渔歌高唱 | (98)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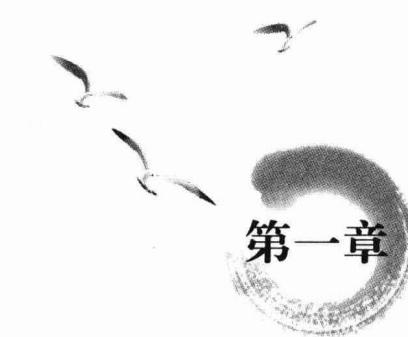
目
录

| | | |
|------------------------------|--------------------------|-------|
| 第七章 | 世俗化的滨海人居新貌 | (104) |
| 一、 | 平民的狂欢 | (104) |
| 二、 | 移民的精神家园 | (110) |
| 三、 | 衣食住行领潮流 | (112) |
| 四、 | 追求民生幸福的探索 | (118) |
| 第八章 | 新时期文化的“艺海拾贝”和吃螃蟹者 | (125) |
| 一、 | 南海新潮：文学艺术创新的排头兵 | (125) |
| 二、 | 踏浪而歌：流行文化开拓的最前沿 | (134) |
| 三、 | 面向海洋：文化大省建设的重头戏 | (138) |
| 下编 航向深海：海洋文化广东之前行 | | |
| 第九章 | 海洋科学发展观的高歌猛进 | (145) |
| 一、 | 人与海洋的和谐共生 | (146) |
| 二、 | 冲破观念的藩篱 | (150) |
| 三、 | 海洋文化竞争制高点 | (154) |
| 第十章 | 思想解放风潮下的海洋大省建设 | (166) |
| 一、 | 海洋大省的黄金决策 | (166) |
| 二、 | 海洋大省经济建设的博弈 | (170) |
| 三、 | 海洋大省社会建设的创新 | (175) |
| 四、 | 海洋大省文化建设的提升 | (181) |
| 参考文献 | | (188) |
| 后记 | | (193) |



上編

嶺海听潮：海洋文化广东之本色



纵览：海洋文化在广东

“向海而兴，背海而衰；禁海几亡，开海则强。”^①

海洋文化是相对于大陆文化而言的。人类文化由大陆文化和海洋文化组成。大陆文化是指以大陆为生成背景的文化，海洋文化是指以海洋为生成背景的文化，“是指人类从受海洋影响而形成的受制海洋而又利用海洋的观念意识及其相应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具体地说，就是沿海的人群由于承受海洋的广阔、宽宏、运动、潮汐、风暴、狂飙、风险、深厚、神秘、丰富、灵变、流通等特性，而衍生的人文特性与精神，以及由此而体现在人的思维活动和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活而产生的行为准则及方式”^②。长期以来，以黑格尔历史哲学为代表的老派西方海洋文化观认为中华文化在起源上没有海洋文化因素，或者中国没有自己的海洋文化。海洋文化被黑格尔当作区别中西方文明的一道界限，他在《历史哲学》一书中说：“中国、印度、巴比伦——占有耕地的人民闭关自守，并没有分享海洋所赋予的文明，既然他们的航海——不管这种航海发展到什么程度——没有影响他们的文化，所以他们和世界历史其他部分的关系，完全只由其他民族把它们找寻和研究出来”；

① 梁启超：《祖国大航海家郑和》，《梁启超选集》，北京出版社 1999 年版。

② 黄伟宗：《广东如何再创海洋文化新辉煌》，广东省政府参事建议，2008 年 8 月 18 日。

“西方文明是蓝色的海洋文化，而东方文明是土黄色的内陆文化”。^①

事实上，在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作为一种不可或缺的文化因子，海洋文化很早就出现在中国沿海地区。“实际上，中国沿海文化与中国内陆文化同样古老。”^②从考古发掘中的发现可以证明：我们的祖先起码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就开始利用海洋资源。古籍上记载的关于秦代徐福和唐代鉴真和尚东渡的故事、明代郑和七下西洋的史实以及汉武帝开始的海外贸易和经久不衰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都证明古代中国在形成海洋文化方面曾作出重大的贡献。可以这样说，中华文化有两个主要源头：一是黄河中下游的中原陆地；二是沿海地带。就沿海地带而言，北方的齐鲁、南方的吴越早在春秋战国时就是沿海诸侯国中的“海上强国”，但在秦统一中国后，齐鲁、吴越的海洋文化逐渐在农业生产的方式上与中原的大陆文化融为一体。只有广东地区，背靠南岭屏障，分隔楚地及中原；面朝浩瀚南海，怀抱珠江巨大密集的扇形河网，自成天然的海洋格局，理所当然地延续着中国的海洋文化，使广东文化成为中华文化里最具有海洋个性、海洋本色的组成部分。它既继承了母体文化的精华，又吸取了当地及外来文化的有益养分，并伴随着广东人民认识海洋、开发海洋的活动，千百年来不断地发展、变化和丰富，成为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部分。

一、广东海洋文化的本质特征

自然生态时期，人类只能在陆地从事生产与生活。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类开始从陆地走向海洋，使陆地与陆地沟通，促进航海与商品贸易的发展。很显然，海洋文化是以海洋为生成背景的文化。这种不同的生成背景，包括地域地貌、气候气象、自然生态、风土民俗以及历史文化等差异而形成显著区别。

1. 中国海洋文化的传统和特色

中国是一个有着广阔内陆疆土（包括山地、平原、草原、沙漠、江河湖泊）的大陆国家，也是一个有着1.8万多千米大陆海岸线、1.4万千米的岛屿与海岸线、7600多个大小不同的岛屿和约470多万平方千米的内海和边海的海洋国家，是太平洋沿岸的大国。伴随着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和繁荣，

^① [德] 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59页。

^② 费正清：《作为一种次要传统的中国沿海》，见黄树森主编：《广东九章》，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7页。

中国的海洋文化也得以形成和发展。

从海洋文化的发生、形成来看，中国人的海洋活动首先应该是以农业性为主的。因为生产力发展的局限性，人们不可能直接发展航海和海洋交通事业，与海打交道自然是从事农业性的海洋活动开始的，如海洋养殖与捕捞、潮田、潮闸、盐田、海塘的扩展等。其次，这些农业性海洋活动应该说是大量的、长期的且稳定的。也就是说，相比起航海和海洋贸易来，这种农业性的海洋活动确实可能更普遍和更大量地被实践着。可是，正如轰轰烈烈的郑和航海被人世代传诵、而日复一日反复的海洋渔业却被熟视无睹的道理一样，航海活动和海洋贸易对于中国人对海洋的观念更有决定性。

考察历代对航海贸易的重视和拓展也不难看出，中国传统海洋文化中有着明显的慕利、重商性质。事实上，中国的海外贸易一度对某些朝代的国家财富和政府运作起到了巨大的支持作用。中国航海传统悠久，航海贸易之利也早已为人们所认识和追逐，中国海洋文化也是首先从重视海洋的“鱼盐之利”和“舟楫之便”开始的。而且，民间航海实践是主要的，民间海洋文化中更大量存在这种“开放商业型海洋文化”因素，民间的航海动机都是具有比较纯粹的贸易性的。

从开放性角度来看，中国古代的海洋观念总体上是一种趋向开放的景象。经历了诸如从秦始皇巡海、徐福东渡到东汉开辟海上丝绸之路再到宋元时期航海贸易的空前繁荣，从对海洋的“鱼盐之利”的初步认识到建立完备的市舶制度以谋求航海贸易之利……这种开放表现在积极拓展航路、发展官民并举的中外双向航海贸易关系，积极与外域建立多方面的联系等方面。朝贡关系早就进入了中国历代皇权的词典中，但纵然如此，也并没有达到把巩固和扩大朝贡关系的政治外交活动凌驾于航海贸易之上的地步，更没有严厉禁止民间航海而独尊官方航海的先例。只是到了元末明初，情况才陡然逆转。

概括说来，中国海洋文化有三大比较明显的特征：

其一，开放性。如同一般海洋文化一样，中国海洋文化本身就具有开放的特性，以往只是由于闭关锁国政策的实施使得这一开放性受到压抑罢了。到近现代，特别是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为当代中国海洋文化的开放性创造了政策环境和条件，开启了当代中国海洋文化的窗口和门户。当代中国海洋文化正在各个领域和不同层次与域外异质文化进行着广泛的接触和交流。

其二，商业性。商业性是一般海洋文化共有的基本特性。中国海洋文化，在精神层面，表现在时下人们普遍具有强烈的商品意识，社会价值取向向经济效益倾斜，社会行为的目标指向也偏重于经济效益，等等；在物质层面，

式进行交易的，甚至不少社会活动也要讲经济效益和体现出以某种物质作交易的特点。

其三，农耕性。这是中国海洋文化最突出的特色。大陆文明在向海洋移植的过程中，存在着农业社会和大陆性格对海洋文化的一种深度制约。不可否认，中国腹地广大，历来以农为本，封建传统更使得土地在中华文化中占据了最重要的地位。这使得农业本位和大陆性格有力地左右着中国海洋文化的整体特性，即使在相对来说最开放的宋元时代，统治者也要不时地强调“朝廷绥抚远俗，禁止末游”，或者反复重申“国以民为本，民以衣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也即观念上的“农本”思想根深蒂固。中国传统海洋文化的农业性、大陆性、封建性是明显的，是整体上的一种深层制约，也是始终发挥着作用的。因此，“无论中国沿海如何早熟，它依旧是中国内陆的一个次要的，甚至未同化的附属物”。“造船、航海和外贸一直是学者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海洋和航海术根本不能令中国文人动心……在这种内在转变中，已经成长于中国沿海的航海——商业生活总是受到人们的贬斥与轻蔑”。^①

因而，考察中国海洋文化的传统，可以发现它与其他国家地域的海洋文化的发展遵循同样的规律，一样是重商和开放的，但具有比较明显的农耕性特征。

2. 广东海洋文化的本质特征

广东地处祖国南疆，面对浩瀚南海，有着3368.1千米长的海岸线，居全国第一；居全国第二的海岛岸线长达2414.4千米，全省海域总面积41.9万平方千米，近800个面积大小不等的岛屿，100多个大中小港口，还有丰富的海洋资源。^②优越的自然生态环境，使广东自古已有“岭海”的称谓。

“岭海”最贴切地表述了广东异于全国各省区的地理特征和文化底蕴，它那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为中国海洋文化的兴起提供了优良的土壤，使之在两千多年前就成为中国海洋文化的发祥地。秦汉时期，从广东雷州半岛的徐闻、合浦等地通往马来半岛和印度等地的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意味着中国海洋文化的兴起和形成。而且，由于“岭海”位于中国大陆的南端，远离大陆文化的核心区，其文化的官方影响较小，民间行为比较活跃，中国海洋文化在广东（即广东的海洋文化）有自己独特的地域色彩。

其一，海（内）外移民文化发育。

^① 费正清：《作为一种次要传统的中国沿海》，见黄树森主编：《广东九章》，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9页。

^② 数据来源：《2006年广东年鉴》，广东年鉴社出版，第133页。

广东濒临南海，东北靠近台湾海峡，海上对外交往一直比较活跃。从汉代开始就已经有人从这一区域向外迁移。后经唐、宋、元、明、清，又有大批的华人因为贸易或者逃避战乱从闽粤地区移居海外。据统计，现今居住在国外的华侨（包括华裔）约有2300多万人。其中绝大部分侨居在亚洲各国，占91.8%，而东南亚的华侨、华裔又占亚洲的90%，主要集中在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等国。侨居国外的绝大多数华侨已取得旅居国的国籍，成为外籍华人。在这些海外移民中，广东省占60%以上。这些移民不仅为迁居地的经济作出了贡献，同时也成为广东海洋文化对外传播交流的纽带。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也成了国内其他省份新移民的安居乐土，外省人士在广东创业和生活，多半不约而同地感谢广东所给予他们的少有排斥的接纳和欢迎。广东珠三角地区成了全国最活跃的移民区，新移民（或被称作新客家人）为广东的发展群策群力，也为广东海洋文化的“北伐”充当了生力军。

其二，对外经贸文化活跃。

自汉代开始，广东居民就开始经南海诸岛向南发展海上贸易，开拓了从南海前往印度洋的“海上丝绸之路”。据水下考古研究中心统计，中国南海的古沉船应该超过2000艘。在西沙群岛附近，水下考古人员在华光礁、北礁、银屿等岛礁发现了五代、宋、元、明、清各个年代的水下文物遗存13处，发掘出一批宋元瓷器、石锚、象牙等文物。特别是2007年12月27日在广东阳江整体打捞成功的宋代沉船“南海一号”，整船金、银、铜、铁、瓷等文物达8万件。居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要冲的南海诸岛，蕴藏着极为丰富的中国水下文化遗产，这是中国人最早到达、最先开发南海诸岛的最好历史见证。这些沉船不仅是宝贵的海洋物质文化遗产，还表明了广东地区活跃的对外经贸文化活动。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更是充分发挥“岭海”之毗邻港澳和华侨众多优势，深入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走出了一条独具广东特色的外向型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之路，对外经贸文化发展成绩斐然：资本输出（对外投资和出口品牌）成为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领头羊，仅2005年一年，全省境外投资就达4.42亿美元，是2000年的6.3倍，年均增长44.6%；以华为、中兴、TCL、德赛、美的、格兰仕、格力等为代表的一批有较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大企业已经在国外打响了中国广东名牌。同时，广东也把自己的文化、价值观打包输送了出去：近年来，在电影、出版、演出、动漫等文化产业的核心领域，一批外向型企业迅速崛起，仅仅是广州天河软件园就拥有华南地区软件产业聚集度最高、发展最成熟、规模最大的国家级软件产业基地，近两年该园在网络游戏

方面的收入约占国内网络游戏收入的 1/4，并且与美国硅谷的美华电脑协会合作建立了广州硅谷软件研发中心，具备雄厚的产业基础和强大的技术力量。

基于以上两大区域特色，加上中国海洋文化固有的优点，广东海洋文化从而具备了海纳百川这样一种极其可贵的兼容精神，以及“敢为天下先”的开拓、进取、创新精神；反过来，广东也在向外拓展和朝内吸纳的大融合中获得更多好处，从而得以形成广东海洋文化的多元化品格。

(1) 兼容性。如同水流的海纳百川，广东海洋文化也具备这样一种极其可贵的兼容精神。文化的兼容性与文化的开放性是密不可分的，开放性必然导致不同文化的交流和接触。不同质文化的交流和接触就免不了发生摩擦和矛盾，甚至发生严重的碰撞和对抗。广东海洋文化在与域外异质文化的交流、接触和碰撞中所表现出的兼容性，主要体现在胸襟的开阔和气度的宽和上，对各种异质文化，广东海洋文化都能与之和平共处，并在共处中取其精华，斥其糟粕，充实自我。

(2) 多元性。岭南文化，尤其是广东地区、糅合了岭南文化特色的海洋文化，历来就是一种多元性文化，在性质、类型、层次等方面都存着多元性。特别是在 30 年来开放政策的大环境下，广东海洋文化的多元性显得尤为突出。一方面，社会主义文化作为主导文化是毫无疑问的，但传统文化由于根深蒂固的影响力而继续存在，改革开放需要借鉴资本主义的先进经验，于是我们奉行“排污不排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我所用；另一方面，政府一向保护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层次间形成并为广大民众所喜闻乐见的不同类型的文化，这种多元并存的格局，使广东海洋文化蕴含着多元价值观。广东是个移民社会，从秦汉、三国到如今，广东曾有过四次大规模的移民潮。特别是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数以千万计的流动人口涌入广东，全国 1/4 的货车开向珠三角。移民社会的人口杂烩，多元价值观深厚的积淀，使广东海洋文化多种多样，色彩绚丽斑斓。多元必会引领出创新，其创新深刻表现在文化精神及经济、政治、社会的整合上。

(3) 开拓性。开拓性可以说是广东海洋文化的本性。一直以来，广东民众就积极向外拓展：以海外贸易为发端，然后出海、移民，到异国他乡求生存谋发展；20 世纪前后发生的康梁北进变法、孙中山策划的推翻帝制和北伐，底气就是广东海洋文化背景下经济的勃兴和思想观念的开放变革。它使中国人第一次感受到广东人“敢为天下先”的文化性格，看到具有兼容、多元、开放、创新求变、果敢进取、重商务实等精神特质的文化。改革开放 30 年来，国门开启，经济呈现外向型，国家大力发展对外贸易，要与世界上所有国家、民族进行经济文化交流，长期以来受到压抑的开拓性在广东得到最大

限度的释放和发挥，人们向新领域开拓进取的意欲表现得尤为强烈，开拓创新几乎成了广东当今行业领域的时尚。

广东海洋文化的特征如此明显，与其“岭海”的自然环境和海岸线长，尤其是珠江与沿海江河出海口多（有八个）这种地理形势密不可分；“水德融和，变通在我”^①，海与河交互作用使不同地域、民族的文化在广东珠江流域内找到自己的位置，在相互容忍、自由发展的同时相互交流整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状态；“水性使人通，山性使人塞”^②，珠江水系四通八达，南面大洋波澜壮阔，生活其间的岭海人们民性果敢、开放、精干、变通……从而造就了独具一格的广东海洋文化。

二、广东海洋文化的门类、特色及内涵

广东海洋文化主要包括海洋物质文化、海洋精神文化和海洋制度文化。海洋物质文化，是在物质产品中融入了海洋精神文化的要素，如海洋建筑、渔民服饰、特色饮食等都承载了相应的海洋文化；海洋精神文化，包括了与海洋有关的心理、心态、观念、价值观以及由此发展各种伦理、道德、宗教、美学、音乐、诗歌、文学、绘画等理论化和对象化的海洋文化；海洋制度文化，主要包括与海洋有关的政治、法律、经济方面的制度，家庭、婚姻等制度还有与海洋有关的生产、生活制度等。其中，广东海洋制度文化与中国其他地域的海洋文化区别并不明显，但由于其经济格局和长期的对外经贸文化的交流，广东在近现代的制度改革和当代的改革开放运动中都先人一步，走在全国的前列。^③

1. 海洋物质文化多元一体

海洋文化在广东的多元并存格局由深具海洋特色的农业、手工业及工业、交通运输业、商业贸易，包括饮食文化在内的其他物质生活的几个方面组成。

其一，海洋农业。

从经济运作的方式看，广东地区以农作物为耕作对象的农业生产仍然占据主体地位。水稻等粮食作物和甘蔗等经济作物的收入是农民的主要来源。由于广东地区的农作物种植的耕作频率较内陆高，一般是一年两熟，甚至是一年三熟，因此农民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从事农业生产。由于农业生产在社

^① (北魏) 郦道元:《水经注校证》，陈桥驿校证，中华书局2007年版。

^② [德] 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

^③ 关于广东海洋文化在现代经济、政治制度改革领域的创新表现，本书第五、六章有详细阐述。

会生活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人们也习惯将开发海洋的过程称作“耕海”，将各种海上种植业和海水养殖业称之为“某某田”，广东渔业与种植业是同时共生的。早在宋代，珠三角地区已开始从事塘鱼生产，饲养鲤鱼、鲮鱼和鲩鱼等，以后发展成连片的桑基鱼塘、果基鱼塘、蔗基鱼塘……成为广东经济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事实上，岭南辽阔的海域很早就孕育出广东人民“耕海”的传统，早在先秦时期，就有了“架田”或“雒田”的技术。到了宋代，广东的耕海技术有了第一次大的发展，出现了蚝田，开始养殖珍珠，并种养江珧。到了明清时期，广东海洋的农牧化生产更是向多元化、规模化方向发展。养蚝初具规模，并出现蛏田，形成蚶田、鲻池。

广东古代除了海上种植业——架田和各种各样的海水养殖业之外，海洋药物的开发也是海洋农牧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早在秦汉时期，《神农本草经》便有了海洋药物的记载，明清时期的《广东新语》中也记载了石花菜和草珊瑚的药用价值和生产规模。

虽然广东沿海居民从事有关海洋的各种活动，但其实质仍然指向农业生产。除此之外，许多涉海经济活动也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辅助农业生产的进行。农业经济的这种多元化发展格局催发了海洋手工业和工业较为全面的发展。

其二，海洋手工业及工业。

广东海洋手工业很早就呈现多样化发展的倾向。早在原始社会晚期，随着手工业从农业部门分离出来，广东青铜器时代沿海的手工业就有很大发展，陶器制造业、纺织和编织工艺多样。广东滨海而且海岸线长，内河河网纵横，这里的原始居民，早在新石器时期就有抱木在海、河漂流进而“刳木为舟”乘坐独木舟航行于河海的经验了。唐以后广东造船业已有相当水平，所造商船可远航至波斯湾和东非海岸；制盐技术也有了重大改进，由原始的海水煮盐演化成制卤煮盐法，既降低了成本，又提高了产量。明清时期，造船业和制盐业都形成专业化或工场化的生产局面；采用新技术制盐，即改晒沙淋滤制卤法为海水制卤法，这和现代海盐生产所需的“天日法”有了极其相似的地方。

海洋手工业的发达，使鸦片战争前的广东成为资本主义萌芽和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近代广东更成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诞生地之一，沿海近代工业于同治末年开始出现，广东机器局、黄埔船局开始制造具有现代意义的船舶。继昌隆缫丝厂是全国同行业第一家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企业。

其三，海洋交通运输业。

广东背靠逶迤五岭，面朝汪洋大海，怀抱密集河网，陆路交通相对落后，水路交通自古以来就是“岭海”广东人与外地人交往的主要途径。

广东在交通方面体现的是一种以“船为主体”的海洋文化特征，这与中原地区以“车马为主”的大陆性交通特征具有明显的差异。《吕氏春秋·慎大览》记载“如秦者立而至，有车也；适越者坐而至，有舟也。”广东民众以习于水性、善于航海而著称于世。

早在先秦时期广东就与南洋诸国有贸易往来，汉代广东徐闻就成为通往东南亚等地的重要港口，西晋以后，海外贸易口岸转移到广州，船只可航行至印度、斯里兰卡以及波斯地区的伊朗、伊拉克等国。唐代，岭南贸易开始有了新的起点，广州成为世界著名商港，是世界闻名的海上丝绸、陶瓷、香料之路的起点。至宋代，指南针的运用使岭海商业贸易的潜在优势开始发挥出来，明清时达到顶峰。明清海禁期间，广州更成为中国对外交往的唯一口岸，其海上交通的重要性可见一斑。海洋交通如此的悠久历史和雄厚基础，使广东在近现代直至今天都是中国交通运输最发达的地区之一。^①

其四，商业贸易呈多元一体格局。

秦以后广东沿海地区海洋农业和手工业的进步，农产品和手工业制品的增多，为海上贸易的兴起提供了条件。自汉平南越后，由于中原王朝对南海诸国珍宝异物的需求和岭南对南海诸国的货物交易，使广东的海上贸易有了初步发展。广东的海上贸易可分为对外海上贸易和国内沿海贸易两类。文件记载则前者早于后者。自西汉开始，广东的海上贸易就一直处于全国最重要的位置。

海上交通的开辟，对于商业贸易的发展和民间人员往来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是世界航海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属于远洋航海的范畴，但与国外以探险和掠夺为目的的航海活动有很大的不同，完全是为了加强沿海各经济区之间的联系。16世纪至17世纪期间，从广州起航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经澳门出海至印度果阿、葡萄牙里斯本航线贸易运往欧洲的丝绸、瓷器、漆器等货物，既是精湛的高级消费品，又是优美绝伦的工艺美术品，深受欧洲国家民众的青睐，并促进了17世纪欧洲其他国家陶业的发展。“欧洲的制造品大量采用中国的饰纹，又进而仿效中国的款式”^②。

海洋农业、手工业及工业、交通运输业、商业贸易之间相互联系、互相促进、彼此依存的局面，使居于岭海一隅的广东人最早和最普遍地形成了强

① 李权时主编，李明华、韩强副主编：《岭南文化》，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5页。

② 田若虹：《近代粤海洋商业文化论》，<http://www.govyi.com/paper/n3/g/200605/61363.shtml>。

烈的商业意识。商品意识的浓厚，也使他们在衣、食、住、行、娱乐等方面活动丰富多彩，特别是饮食方面的丰饶、博杂，令人耳目一新而口腹满足。

2. 海洋观念文化多彩多姿

由于广东地处“岭海”，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这里的居民比内陆居民更有机会接触外来新事物。经过长期的文化交流和融合，广东人民把中国传统文明和外域文明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带有浓郁海洋特色的文化系统。

(1) 海神信仰文化广泛。以海洋为活动舞台的生活方式，使粤民间信仰中的海神崇拜很发达，但广东民众并不因此而忽视或排斥对宗教和其他民间信仰的崇拜，而是呈现出多种宗教信仰共存的局面。如广州地区，不仅有千年古刹，还有道教道场；不仅存有伊斯兰教清真寺，还有不少天主教堂。在“岭海”区域中最盛行的民间信仰是海上女神——妈祖信仰。

(2) 语言文化景观多彩。这体现在粤方言与侨居国语言的互相影响。长期的商业运作，使民众在文化价值观上渐趋认同，这种文化认同世代相袭，出现了许多关于商业道德、规矩和经验的谚语。这些商业经营的谚语为广东的语言文化及海洋文化增添了丰富的内容。两者交相融合，形成了侨乡方言有大量外语词汇融入，主要是口语中英文词汇夹杂的景观。广东人把出国谋生叫做“过番”；一些“番客话”也成为粤人的日常用语，粤籍华侨（华人）习惯用这两个语素来表示“祖国的”和“外国的”的概念，并由此构成了一系列表示“中国的”和“外国的”的词语。例如“唐山、唐人（中国人）、唐人街（Chinatown）、唐人语（中国话）”，“番畔（海外、外国）、番客（华侨、华人）、老番牯（老华侨）、番婆（外国女人）、番仔（外国人）”，把圆珠笔叫做“原子笔”，等等。

(3) 建筑艺术中外交融。建筑作为一种最直观的文化符号，是一种动态和充满时代感的文化。广东的建筑艺术同样吸取了西方文化所长。如广州十三行外国商馆，俗称“洋馆”，是中国大陆出现的第一批“洋楼”。1888年建成的广州天主教石室圣心堂，是全国唯一纯花岗石结构的哥特式教堂建筑，体现了典型的法国哥特式建筑风格，建筑格局基本上是法国巴黎圣母院的移植。西方建筑风格的传入，对官方建筑、民间住宅、工厂、商业建筑均产生了影响。如广州沙面集中了数以百计的各类西方建筑，包括领事馆、银行、洋行、教堂和学校等。这些建筑总体以英式和法式为主，并有哥特式、新古典式、新巴洛克式等，建筑风格迥异，体现了西方各国多种建筑风情。始建于20世纪20年代的汕头小公园沿街骑楼，建筑形式也显然受到欧陆风格的影响，其独特的街道特色和浓郁的商业氛围，保留了潮汕人民“过番”与侨居国人民交际及其影响的痕迹。